

# 持續優化「兩蚊兩折」 展現以民為本責任擔當



議事論事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的「二元乘車優惠」計劃，由4月3日起調整為「兩蚊兩折」。根據新政策規定：成人票價10元或以下，一律收取2元；成人票價高於10元，受惠人士須繳付成人票價的「兩折」。這項調整引發社會熱議，如何在財政可持續性與保障長者福祉之間取得平衡。這不僅是一道經濟題，更是一道考驗施政智慧的治理題。隨着政策的調整，相關部門應透過更精準的數據監察與配套優化，繼續照顧長者出行所需，展現以民為本的責任擔當。

## 制訂應對方案完善政策

長期以來，民建聯致力推動二元優惠計劃，並主張保留60歲及以上的受惠範圍。我們認為，因為這項政策背後所承載的社

會價值，超越了賬面上的財政支出。透過政策鼓勵長者及弱勢群體走出家門，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不僅能提升他們的身心健康，更有助於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銀髮社會」。從長遠的社會成本角度來看，保持長者社交活躍，能有效延緩認知障礙及各類慢性病的發生，進而減輕在醫療及院舍服務方面的公帑開支。因此，維持政策的覆蓋範圍，本質上是對社會健康資本的一種戰略性投資。

然而，隨着人口高齡化的加劇，二元優惠計劃帶來的財政壓力亦是不爭的事實。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現時「兩蚊兩折」的受惠人數為267萬人，隨着人口老化，估計十年後將增加至320萬人。「兩蚊兩折」方案的核心目標在於實現政策的財政平衡與可持續性。根據相關部門參考「樂悠咭」實名制的數據分析，約有六成的長者出行車程票價在10元以下，

有超過75%的優惠使用者日常選乘的路線票價不超過10元。這說明新方案對於絕大多數長者的出行需求影響甚微，大部分車費都維持2元。而針對長途車程引入「兩折」機制，相信能有效改善「長車短搭」造成的問題，是在財政和福利上取得充分平衡的措施。

然而，在新措施實施初期，相信仍有部分長者對新方案的車費計算方法不太清楚，相關部門應持續透過加強宣傳，或是通過服務大使、區議員、關愛隊、社福機構員工等向長者解說，讓長者明白車費其實是很容易計算的。

同時，部門應保持高度的警覺與敏感度，密切監察長者出行的大數據變化。社會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因長途路線的交通費上升，導致長者出行意欲下降，進而產生孤獨感或社交隔閡。特別是對於居住在新界、偏遠地區或離島的長者及弱勢群體

而言，他們外出就醫或探訪親友，往往需要乘搭票價較高的交通工具。對於這部分群體，交通費用的實際漲幅可能會比市區居民更為明顯。若數據顯示有長者跨區活動頻率大幅減少，則可考慮制定額外交通補貼或針對性優惠等應對方案完善政策，確保政策的公平性不因地理位置而受損。

## 落實巴士分段收費計劃

此外，抑制「長車短搭」雖具合理性，但應考慮到社區交通的現實困境。在非繁忙時段，許多社區的常規短途巴士班次相對疏落，等候時間過長迫使長者「見車就上」。若在實施「兩蚊兩折」後，長者為了節省開支而被迫在烈日或寒風中長時間候車，顯然違背政策的初衷。因此，有關部門需與巴士公司充分溝通，優化資源配置。一方面，可根據長者的出行數據，在需求量大大的地區增設短途接駁班次；長遠

而言，可落實全港性的「雙向分段收費」計劃，將落車拍卡收費普及至全港巴士路線。讓長者無論選乘長途或短途車，均能享受與短途車相近的計費標準。這才是根治濫用問題、同時惠及長者的治本之策。

「兩蚊兩折」方案是在有關部門直面財政情況和人口老化下，所作出的政策優化嘗試。但在衡量政策時，不應過分着眼節省了多少公帑，更應密切留意政策調整會否對長者生活造成不便。為此，相關部門應持續、動態地監察政策調整對長者出行的實際影響，對於可能出現的社交縮減或基層負擔加重等情況絕不可掉以輕心，務求在執行過程中及時發現並解決問題。在推動城市變革的過程中，也應展現充分的擔當，讓長者依然感受到社會的溫度，實現自由出行、老有所樂的生活願景，邁上健康活力的退休生活。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 篤行兩會精神 開創香港新局



議論風生

全國兩會閉幕後，香港社會迅速展開多層次、多形式的學習和宣講兩會精神活動，從特區政府到各界團體，均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發展方向與香港角色定位。這一過程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兩會精神如何從「認知層面」轉化為「治理能力」與「發展能力」，並在制度與政策層面形成可持續的落實機制，避免流於形式化理解。

從今年兩會釋放的政策信號來看，「高質量發展」仍然是主線，科技創新被置於更為核心的位置，同時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相關部署已具體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點任務之中，包括發展新質生產力、持續推進重點產業提質升級、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以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等。

對香港而言，這些方向的實質意義在於：國家發展已全面轉向質量導向，而香港能否在其中發揮作用，取決於香港能否將自身所長有效對接國家所需，更好地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轉化為具體的成果。

## 「通道功能」轉向「平台功能」

因此，學習領會兩會精神，不能停留於「香港具備哪些優勢」，而必須回到「這些優勢如何被制度化運用」。香港長期強調「超級聯繫人」角色，但在當前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中，單純的「聯繫」已難以支撐其功能定位，必須進一步轉化為「價值創造」能力，即在資本配置、風險管理、專業服務及國際規則對接等方面，提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增值功能。這也是兩會持續強調金融體系建設與對外開放協同推進的內在邏輯——香港的角色，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由「通道型功能」轉向「平台型功能」。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入更深層次的制度對接階段。過去幾年，大灣區更多體現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政策便利化，而當前的核心問題已轉向規則銜接與制度融合。兩會提出要提升區域發展整體效能，實際上對香港提出了更高要求：若

仍停留於被動銜接，將難以在區域競爭中保持優勢。尤其在科技創新領域，國家強調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並重，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關鍵不在於單一科研成果，而在於能否打通「科研—轉化—產業—金融」的完整鏈條，並在此過程中培育具備跨界能力的人才結構，特別是能夠同時理解科技、產業與資本運作的青年人才，將成為支撐這一體系的重要力量。

制度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在當前階段亦更加清晰。筑牢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就是有效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繫。穩定、可預期的法治環境，是國際資本配置與高端人才流動的重要前提，同時亦為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清晰的制度邊界與發展預期，使其能在相對確定的制度框架下規劃長期發展路徑。

進一步來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亦標誌着香港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轉折。中央明確支持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更積極作用，而特區政府正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這意味着香港將由過去相對被動的政策承接者，轉變為需要進行系統性發展設計的主動規劃者。這一轉變不僅體現在政策層面，也體現在治理邏輯上——由分散推進走向整體統籌，並以更清晰的發展路徑引導資源配置與社會預期。在此過程中，青年群體不僅是政策受益者，更應逐步成為參與者與推動者，通過創新創業、專業服務及跨境發展等方式，直接嵌入國家發展與香港轉型的結構之中。

## 承接機遇形成動能

總體而言，兩會精神對香港的啟示，已從方向性指引逐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要求。關鍵不在於是否「了解」，而在於能否建立一套將國家戰略轉化為本地政策、再由政策轉化為發展成果的有效機制。這既涉及政府的統籌能力，也取決於社會各界，尤其是新一代青年能否在各自專業領域中承接機遇、形成動能。只有當「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之間建立起高效的對接關係，並轉化為可持續的人才與產業結構，兩會精神才不會停留於文件與口號之中，而能真正成為推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內在動力。

廣東省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

# 全球市場的混亂恐慌與中國製造的「逆勢突圍」

看經濟

中東戰事引發能源價格飆升並帶來全球恐慌，但3月份的中國製造業活動今年以來首度恢復擴張。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3月中國採購經理指數運行情況，3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比上月上升1.4個百分點，高於臨界點，製造業景氣水平回升。

雖然PMI只是僅僅微超榮枯線，但在煙霧瀰漫中東、焦慮籠罩全球的情勢下，中國給混亂動盪的世界帶來了難得的希望與願景。3月份的PMI數據，不僅是中國經歷了兩個月收縮後的技術性反彈，更是全球供應鏈在遭受美以伊戰事的地緣政治衝擊後，收穫為數不多的積極信號。

## 中國穩定性讓世界安心

在看不到中東戰火停歇和霍爾木茲海峽恢復正常的任何跡象下。短期看，國際油價將持續居高不下，航運成本也將繼續高企，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也難以避免。在「黑天鵝」亂飛、「灰犀牛」橫衝直撞的時期，中國製造業「回暖」的消息，尤其顯得寶貴。中國製造業的擴張，承載的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的輪動，也非「風景這邊獨好」的隔岸觀火，而是以自身強韌性和穩定性讓世界安心的大國責任敘事。

縱觀全球，美國是中東戰事的製造者，也是「美國優先」霸權邏輯的實施者，更是導致全球市場紊亂、能源價格攀升的始作俑者。傳統的製造業強國如德國、日本，因其對海外能源和原材料的極高依賴度，正承受着巨大的工業生產壓

力。標準普爾全球評級編製的多項3月份採購經理指數均出現下降，這表明全球大部分地區的製造業情緒是悲觀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正在製造一場「全球性但不對稱」的衝擊。對於歐洲和亞洲的許多經濟體，這幾乎是「末日劇本」的重演——能源價格飆升，物流通道受阻，企業要麼面臨斷米之炊，要麼被迫吞下高昂的成本。

相比之下，中國PMI 50.4%更具深意。這不僅是「春節後復工復產」所能完全解釋的。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當全球供應鏈從「效率優先」被迫轉向「安全優先」時，中國憑藉其全產業鏈的優勢，展現出了極強的「系統穩定性」。在外部因能源恐慌和物流斷裂而恐慌時，中國完善的能源結構，尤其是煤化工等替代路徑，為生產線的連續運轉提供了寶貴的緩衝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3月份的PMI升幅由製造業內涵提升所帶動。數據顯示，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PMI分別為52.1%和51.5%，持續高於總體水平。這意味着，驅動此次擴張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低端代工，而是更具韌性的新質生產力。在全球對AI算力、新能源設備需求爆發的背景之下，中國製造憑藉其穩定的交付能力和技術積累，正在成為全球資本尋求「確定性」的避風港。正如有分析指出，全球對製造能力的需求正在上升，而中國憑藉完整的產業鏈佔據了有利位置。

當然，我們絕不能因為一個月的擴張數據而掉以輕心。中國製造業擴張的持續性仍面臨嚴峻考驗。只要美以伊戰事一直持續，

全球能源價格將長期維持高位，這對任何製造業大國都是不小的負擔。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高油價無異於對國民經濟徵收一筆「隱形稅」。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如果全球經濟增長因能源衝擊而顯著放緩，最終會通過外需萎縮傳導至中國沿海的工廠。3月份PMI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雖然有所回升，但幅度溫和，且後續走勢高度依賴海外主要經濟體的抗通脹與抗衰退能力。與此同時，國內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過程中，地方債務化解壓力未消，內需的全面回暖仍需時間。

## 宏觀政策精準發力

因此，中國3月份的製造業擴張其實更像是關於「韌性」的經濟樣本。內中意味是，在動盪的世界裏，中國擁有最完整產業集群、最龐大工程師隊伍和最快響應能力的製造業體系，即便面對戰火與通脹的雙重擠壓，依然能夠找到生存與增長的空間。但這種韌性並不是無限的，也不是無代價的。每一次成本衝擊的消化，每一輪供應鏈壓力的化解，背後都是無數中小企業艱難的調整，以及宏觀政策精準發力的體現。

總之，從3月份波斯灣戰場的硝煙瀰漫和全球市場的恐慌不安，到中國製造業的「逆勢突圍」，說明了一個殘酷事實：沒有誰能獨善其身，但總有誰更能扛住風浪。中國3月份的PMI回到了榮枯線上方，是相對樂觀的信號，但絕不是可以鬆懈的理由。在戰火未熄、能源價格高企的陰影下，中國製造業要走的，依然是承壓而行的漫漫長途。

國際關係學者

# 長期戰略失誤 德國淪為「歐洲病夫」



看大勢

美伊衝突爆發後，來自德國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終於承認歐洲去核能化是戰略錯誤。考慮到德國是最典型的去核國家，其矛頭指向不言自明。然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卻以「去核難以逆轉」回應。

德國從過去的「歐洲發動機」變成了今日的「歐洲病夫」，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外交到內政，長期犯下嚴重戰略方向性錯誤。以對華關係為例。今年繼法國和英國領導人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也來到中國訪問。與過往相比，默克爾的訪問有兩點頗為反常：

第一，這一輪中歐外交互動，他是最後一個訪問中國的歐洲大國領袖。相比上一任總理朔爾茨，大為遜色。朔爾茨不僅是疫情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歐盟和西方領導人，而且當時還面臨着西方一片反對、質疑之聲。因為彼時正值美國將中國視為國家安全最大威脅，歐盟視中國為系統性對手並重新考慮對華關係之際。儘管面臨如此大的壓力，他仍然堅持做第一個，甚至拒絕了法國總統馬克龍一起同行的建議。

第二，默克爾2005年擔任總理僅6個月就訪問中國。那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僅為德國的四分之三，雙邊貿易額不過700億美元，中國也僅是德國第四大進口來源地。現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是德國四倍，也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對德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10個月之後才訪問中國。此前則頻頻訪問歐美、中東。特別是他首次訪問亞洲竟打破慣例去了印度。顯然從排序上，就看出中國在默克爾心中的分量。

可以說今天的中德關係就能折射出德國之所以走向「歐洲病夫」的原因。

從經濟角度說，正常來講，世界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濟永遠是第二位的，它可以成為安全和地緣政治的犧牲品。比如俄烏衝突後，西方對俄羅斯進行了兩萬五千多項經濟制裁。美國寧可放棄中國這一個全球第一大芯片市場也要禁止對華出口。但德國由於二戰的納粹歷史，它不算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能發展軍事，也不能搞地緣政治，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只能取決於經濟，經濟是德國最高戰略利益。

所以長期以來德國一切的核心都是圍繞經濟發展，但是自俄烏衝突之後，2023

年和2024年連續兩年經濟負增長，是全球大國中唯一一個陷入經濟衰退的國家。2025年經濟依然停滯不前，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0.2%。但俄烏衝突只不過是一個外部的催化劑，更根本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德國國家戰略上出現了結構性、方向性的失誤，也包括對華關係。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德國經濟有兩個獨特之處。一是沒有搞去工業化，製造業的比重是西方國家最高的。二是經濟發展的出口導向。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德國一是需要一個穩定的能源供應。因為製造業對電力和能源的消耗遠超過第三產業，這也是主要成本之一。二是需要一個穩定和開放的市場。因此同處歐洲的俄羅斯能源、遠在亞洲的中國巨大市場對德國就是戰略性的。德國產品的質量只是其競爭力的一個因素。

但近十幾年，德國自己卻拆掉了經濟發展的外部支柱。這首先體現在能源上。一是以日本發生核電廠洩露輻射意外為由放棄核能，這在全球都是罕見。像法國核能就一直佔全國能源供應的70%。二是一方面強化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另一方面又支持北約東擴。最終當俄烏衝突爆發後，

不得不放棄俄羅斯能源。直接後果是德國產品國際競爭力迅速下降，經濟受到嚴重衝擊。

經濟惡化立即產生了政治後果。一是極右政黨崛起。二是傳統政黨支持率下降，不得不和立場相距甚遠的小黨組成聯合政府。這些小黨意識形態色彩強烈但又缺乏足夠和必要的專業知識，特別是在國際問題上。於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第二個問題：中德關係開始出現動盪。

2021年接替默克爾的朔爾茨組成德國歷史上首個「紅綠燈」聯合政府。綠黨出身的貝爾伯克作為外交部長支持北約東進，對中俄兩國非常強硬。特別是批評中國政治和干涉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灣問題。為此中國召見了德國駐華大使。也就在2023年，德國步歐盟後塵，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對手。

默克爾政府又重蹈前任覆轍，外長瓦德富爾上任伊始再次對台灣問題說三道四，而且還選在日本發表相關言論。德日兩國都是二戰策源地，給人類帶來巨大歷史災難。這導致他首次訪華行程一度取消。

對華政策反映了德國兩大戰略失誤。一是在失去俄羅斯之後，中國對德國的戰

略價值大幅上升。這也是為什麼德國企業加碼在中國投入的原因。此時的德國更需要中國，更需要維護好中德關係。但德國卻反其道而行之。二是「價值觀牌」和「台灣牌」不是德國所能打的，超出了其國力。過去法國打過，也早就放棄了。這兩個牌就是世界霸主美國打也力不從心。特朗普兩次執政都放棄「價值觀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和經濟成本太高。

總的來說，中俄對德國都是戰略意義的國家存在，與它的國際地位和命運息息相關。如果說失去俄羅斯還有一些客觀原因，但和中國的衝突卻完全沒有道理。德國不妨看看法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能源獨立，市場對外依賴也小，國家綜合實力如軍事、外交遠超德國。但它卻不會像德國那樣冒犯中國。

外交交往還是內政的體現，由外交而知內政，這對依賴外部環境的德國尤其如此。俄烏衝突、美伊衝突、對華關係都事關德國在全球的立身之本、核心戰略利益：經濟。只是德國一再跌倒在同一條河流中，日益成為病夫。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